

前不久,由秦昊和任素汐领衔主演的电视剧《亲爱的小孩》霸屏,点燃了国内一众适龄女性的生育焦虑。该剧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向观众展现了一对中年小夫妻生育一个孩子后兵荒马乱、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碎片,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家庭矛盾和无常的命运带来的巨大挑战:女儿患上了白血病,本已被庸常现实打败而离婚的他们,又共同加入到了“救女”行动之中。在此过程中,他们认清了生活的真相,谅解了彼此的难处,女儿获得拯救的同时,成年人也获得了成长和救赎。

女性生育困境的全面展示

南方小城,昏暗的光线,正在卸妆的孕妇。故事的设定一开始就充满压抑与焦虑,导演用大量镜头白描了生育给女性带来的诸多困难:行动不便的身体,大打折扣的颜值,生理不适带来的心理焦虑……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女性观众的共鸣。接下来,秦昊饰演的丈夫没有陪怀孕的妻子一起吃不加辣椒的拉面,妻子待产过程中他却回家看球喝啤酒,为给自己妈送女儿胎盘从而错过妻子出产房等一系列操作,更是点燃了女性观众的一腔怒火——这不就是身边那个“油瓶倒了都不扶”的老公嘛!

任素汐饰演的方一诺用朴素的演技塑造了一个产后焦虑又隐忍无比的真实的孕妇形象,深刻揭示了当下女性的生育困境。无论是否有贩卖焦虑之嫌,《亲爱的小孩》可以说是具备了直面社会问题的勇气。生育问题成了当下女性不可言说之痛,与人们的婚姻观、两性观甚或家庭观有莫大的关系。女性解放运动在我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始,到今天已走过一百多年的漫长道路,“娜拉走后怎样”的困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得到了有效解决,女性通过不断努力和争取,凭借自身的能力获得了和男性同等的权利和地位,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成为职业女性。

在鲁迅先生创作于1925年的爱情小说《伤逝》中,追求自由且思想独立的子君,冲破世俗的藩篱不顾一切选择和涓生结婚,但婚后的她却陷入繁琐的家务之中,渐渐失却了追求进步的动力,最后被涓生所抛弃。新时代的方一诺与旧时代的子君自然不同,方一诺是一名教师,有着独立的收入来源和较高的社会地位;然而,她和子君面对的似乎是同一位丈夫,活在新时代的肖路较之在旧时代抛下子君的涓生,并没有实质的不同。

男性成长路径的有益探索

《亲爱的小孩》播出后,受众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应。许多人认为剧情夸大了婚姻生活中的矛盾,为博眼球而贩卖焦虑和苦难;也很多女性观众表示产生了强烈共鸣,剧中反映的生育焦虑和单身式带娃,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职业女性并没有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反而要承担双重压力:不仅要应对职场上的压力,下班后还要面对繁重的家务和养育孩子的任务。不论结果如何,《亲爱的小孩》的勇气所在,正是敢于呈现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并用男主角肖路的成长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

剧中,带娃的艰辛和生活的一地鸡毛,让夫妻俩貌合神离,肖路情感的游离成为婚姻大战的导火索。倔强的方一诺选择了结束婚姻,并且以不准见女儿的方式惩罚肖路,直到他们的孩子禾禾得了白血病,这种局面才得以缓和。一开始,一诺想独自承担一切,不想告诉肖路女儿生病的事实。她企图用剥夺肖路做父亲的权利来惩罚他在婚姻生活中的不作为与背叛。离婚后的肖路,得知女儿身患白血病后心痛不已,剧里甚少直接描述他的心理活动,而是用他具体的行动展示他的转变和成长。曾经视事业和出人头地为生命的他,在女儿刚出生时经常喝到凌晨才回家,如今他可以为了照顾女儿,可以和抱持不婚主义的老板翻脸;曾经带女儿去医院排队打疫苗连奶瓶都用不好的他,如今可以为了拯救女儿,想尽办法乞求医生规劝“悔捐”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回心转意;曾经在女儿深夜哭闹时醒都醒不过来的他,如今可以在病房陪着女儿看漫画、为她讲故事,带她“飞高高”……

这一切的转变,也让方一诺释怀了,她不再阻止肖路见女儿,也尝试接受肖路以及其家人的帮助。《亲爱的小孩》后三分之一的剧集,刻画了肖路个人的成长,正是由于他担负起了肩上的责任,对家人多了关心和耐心,后面的剧集才更有人情味和温暖的底色。除了对女儿禾禾,肖路其他方面也展现了他的成长和转变。比如对后来的妻子董帆,从不插手厨房的他开始学着做早餐,做鱼,煮粥,学着细心照顾她的生活起居。董帆的人生之路比方一诺幸运,因为她遇到的是已经自我革新成长过的肖路。

鲁迅先生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这个角度来说,《亲爱的小孩》无疑是成功的,它深度还原了女性在当下社会中所面临的生育焦虑和困境,而如何破解这个看似无解的困境则在剧中已经给出了暗示,男性在思想上的自我革新和身体力行的成长就是最好的解答。

作者简介:孙洁,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



《亲爱的小孩》: 生育困境与成长路径

孙洁

乡村蝶变春潮涌

榜文长篇小说《我和你》先睹记

李厚恩

整整五个寒往暑来,胶州籍文人榜文先生终于完成了长篇小说《我和你》。在该书即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前,我有缘率先拜读一番,读罢感慨万千。全书洋洋洒洒三十万字,通过乡土化的语言、具象化的场景、典型化的故事,刻画了一群生动鲜活的人物,将读者带回到改革开放之初的难忘岁月,也为乡土文学园地又添一道丰满的新绿。

鲜活的人物形象。小说以胶高县胶河公社杜岭村两个家庭——崔家、杜家的悲欢离合为主线,塑造了崔进学、杜建德、赵大姐、李有财、张玉兰、赵丽丽、张秀月、刘小慧等人物形象。崔进学是农民子弟穷途末路走出杜岭村闯天下的典型,杜建德是在乡青年依靠族荫立足社会历经风雨最终实现理想的典型,他们的殊途同归,正是四十年改革开放彻底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改变农村面貌、改变农民命运,从而促进当代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与进步的缩影。这一变革突如其来,因此就如同路遥的小说《人生》中的人物一样,“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路的”,唯有勇者才能百折不挠立足潮头。

生活的悲喜剧在崔进学身上表现最为典型。他原有一个温暖的家,却因替他换亲诱发的悲剧中母亲和妹妹双亡,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南方打工,因祸得福认识了女工张秀月,有了梦寐以求的家庭并一度衣锦还乡,在广东从看大门开始一步步做到副厂长,却因张秀月不能生育二人分道扬镳。最终张秀月被刘小慧取代,有情人终成眷属。崔进学不仅自己凭借在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奋斗取得人生事业成功,还帮助一度顺风顺水的老同学杜建德走出泥沼东山再起。

面对风起云涌的改革开放,杜岭村有人试图固守过去的生存逻辑(如崔进学的母亲),也有很多人(如李有财、张玉兰夫妇)跟随时代的脚步随波逐流、终于被时代大潮吞没,甚至还有崔进学的妹妹崔美芳,不理解这一变革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在情与理的纠结中不能自拔,在改革开放第一缕曙光来临的时刻,殒身于生育养育她的这片土地上。赵大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她的混混儿子李有财,最初似乎跟上了时代潮流,因敢于能干发财,后德不配位驾驭不了手里的金钱,成为金钱奴隶在醉生梦死中殒命,连累到发妻张玉兰。李有财这个人物,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具有很强的典型性,现实生活中也不乏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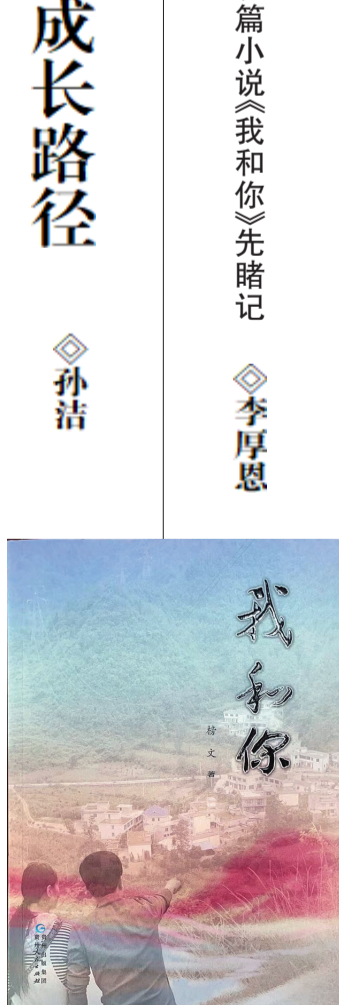
广阔的社会视角。作品将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农村婚丧嫁娶、人际交往、经济活动、社会运行,浓缩在了上世纪80年代到上世纪末胶东半岛胶高县胶河公社杜岭村这样一个时空之中,当然,也涉及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小说写的是农村生活,却没有把过多的笔墨放在农事上,而是借助杜建德、赵丽丽的活动展现了上世纪下半叶农家子弟跻身高校以及回到家乡参与企业经营、社会活动的经过,这一点十分切合四十年以来亿万农家子弟命运发展的轨迹,是四十年农村改革发展的真实写照。

小说后半部分浓墨重彩描写杜建德出任主要领导管理社办企业胶河公社铁木厂的经历。他没有像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老乔那样大刀阔斧,但也跟老乔一样不肯随波逐流,终于不可避免地依附于集体企业的蛀虫刘小五发生激烈冲突。刘小五为人卑鄙,却“并非一个人在战斗”,他通过金钱输送与县机械局曹副局长、铁木厂车间主任赵一山、门卫等人结成利益共同体,疯狂盗卖铁木厂的资产。杜建德虽抓了刘小五盗窃的现行,但在刘小五的利益共同体面前不得不败下阵来,体现了改革的艰辛曲折和法治的暂时缺失。杜建德失意之后,本想借祖传中医秘方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大夫,但在妻子赵丽丽和老同学崔进学的支持下反败为胜,把倒闭的铁木厂改制为民营企业——青岛标准件厂,最终取得经营成功,体现了时代大潮滚滚向前不可阻挡之势。

平实的艺术风格。小说的情节基调乐观向上、不蔓不枝,对于悲剧“哀而不伤”,语言清新朴素,富有诗情画意,描写手法十分生动逼真,抒情味浓,既有中国古典叙事小说的韵味,也有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的文笔特色,将一个胶东半岛小村庄改革开放的悲喜剧描绘成一幅全景展现新老事物碰撞交融的“清明上河图”。通篇小说读来能够感受到生动活泼的画面感,可见作者是一个热爱生活而且善于观察和描写生活的人。

小说故事发生的地方,“杜岭村,位于胶东半岛胶高县西南部的胶河公社南边,离公社三公里,离县城四十公里,因为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发达,所以,村庄经济落后,村里人的观念更落后。不仅杜岭村落后,胶河公社落后,甚至与胶河公社沾边的周围的其他公社也落后,又因为落后公社都集中在县城西南部,于是,‘西南乡’在胶高县成了落后的代名词”,这样的表述,在胶东本地人乃至在乡村成长工作过的人们看来,具有熟悉的陌生感,处处感受到浓郁的胶东乡镇生活气息。书中所描述的一些胶东乡间民俗,也是改革开放之前胶东民间生活的真实写照,读来倍感亲切自然。

作者简介:李厚恩,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著有《碧血浸江淮——清代四大奇案之李毓昌案》《山河作证——孔有德登莱兵变》《郑成功·前传》。



《文艺评论》征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
投稿”。(2000字+短视频评论)



「文化青岛」
扫码关注